

社会学译丛
理论前沿系列

Discourse
and Social
Psychology

[英] 乔纳森·波特
Jonathan Potter

著

玛格丽特·韦斯雷尔
Margaret Wetherell

肖文明 吴新利 张攀 译
方文 校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话语和 社会心理学

Beyond Attitudes and Behaviour

超越态度与行为

理论前沿系列
社会学译丛

话语和 社会心理学

Beyond Attitudes and Behaviour

超越态度与行为

Discourse
and
Social Psychology

[英] 乔纳森·波特
Jonathan Potter

著

玛格丽特·韦斯雷尔
Margaret Wetherell

肖文明 吴新利 张擘 译
方文 校

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话语和社会心理学:超越态度与行为/(英)波特,(英)韦斯雷尔著;肖文明等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社会学译丛·理论前沿系列)

ISBN 7-300-06981-9

I. 话…

II. ①波…②韦…③肖…

III. 社会心理学-研究方法

IV. C9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40982 号

社会学译丛·理论前沿系列

话语和社会心理学

超越态度与行为

[英] 乔纳森·波特 玛格丽特·韦斯雷尔 著

肖文明 吴新利 张 肇 译

方 文 校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239 (出版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丰印刷厂

开 本 965×1300 毫米 1/16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张 21.25 插页 2

印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09 000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译 序

时隔近 20 年之后，一本书从英伦远渡重洋来到中国，一方面见证了其自身的价值，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社会科学界吸纳西方学术进展的工作尚任重道远。这一旅程经历了巨大的语言转换，同时也经历了诠释的转换。作为译者，我们有幸或者不幸地（对学界而言）见证了这一转换，促成了这一转换，但我们绝不敢说，我们已经完成了这一转换。这一诠释转换的旅程，要靠中国社会科学自身的前行来做注解。而本文，无非就是庞杂的注解中的一个小标记，我们期待这一注解能够更丰富、更充实。

本书的两位作者都可谓是“文坛老手”，如果不是著作等身，至少也算得上是著述宏富。两位都是术业有专攻之人，在过去 20 多年里，为推动话语分析在社会心理学乃至社会科学界的影响立下汗马功劳。文坛老手的资质与术业有专攻的知识，二者之结合，便是能以通晓简练的文字对学术脉络和观点进行很好的梳理和阐释，这在本书中便有鲜明的体现。考虑到本

书的这一特点，加上作者特意为中文版所撰写的跋提纲挈领地勾勒了本书的主要内容，本文就不拟对本书内容进行多余的复述，而着重于对本书所涉及的一些概念与问题进行简要的评析。

一、社会心理学的危机

危机的出现

在谈论一个学术事件时，我们大体上可以循着余英时所说的“内在理路”和“外在理路”进行评析。所谓“内在理路”是指学术自身的传承、对话与流变如何影响了学术的发展，“外在理路”则关注于具体的历史社会因素如何型塑了一个时代的学术旨趣和特性。当然，“内在理路”的说法不是想缔造一个与外界绝缘的学术空间，它只是想强调，学术关怀或者说学统，具有超越当下的一定的独立性。

在我们谈论本书的出现以及它所带来的种种后续影响时，一个躲不开的事件就是社会心理学的危机。社会心理学的危机大体发端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心理学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和二战之后的突飞猛进的发展之后，似乎突然受到剧烈的挫折，局内局外都不断发出批判的声音（沈杰，1996；乐国安、沈杰，1998）。这一事件发生的原因，迄今仍众说纷纭，我们这里也只能做一简要的介绍。从“外在理路”来说，社会心理学的成长本身就与具体的历史事件息息相关。卡特怀特评论说，希特勒对这个学科的发展“贡献最大”（Cartwright, 1979），这是因为二战迫使大量优秀的欧洲社会心理学家转战北美，同时二战也提供给社会心理学家大量的用武之地，因此极大地促进了这个学科的影响和成长。然而，这种天赐良机并不能持续很久，面对战后的种种社会问题，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后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社会心理学束手无策，“‘社会工程师’的自信心及公众的期望降到最低点”（方文，1997）。不能继续扮演社会工程师的角色，这是导致社会心理学危机的社会因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卡特怀特将社会心理学危机的部分原因归结为对自己学科的不自信和不切实际的预期。

对社会心理学的发展现状的不满，基本构成“内在理路”的主要内容。这些不满大体包括：（1）对实验方法的不满，如实验中存在的期望效

应、需求特征，以及普遍增长的对伦理问题的关注等；(2) 对于过度依靠实验方法的不满，很多人认为实验在理解人类行为上具有不可突破的局限，而且有过于看重方法，乃至有流于方法主义之嫌 (Cartwright, 1979)；(3) 对社会心理学理论的不满，这包括缺乏对社会组织和社会结构进行解释的理论 (见中文版序)，缺乏长时段的研究 (Cartwright, 1979; Boutilier et al., 1980)，缺乏理论的整合；(4) 在基本的学术取向上，不满于个人主义的立场，这种个人主义尤其表现为过度关注个人认知，将个人简化为信息加工者，相应的便是要求社会心理学“更社会” (more social) 的主张。

布提利尔等人从社会心理学的两个母学科——社会学和心理学——来追溯对社会心理学不满的原因 (Boutilier et al., 1980)。在社会学内部，古德纳 (Gouldner) 等人不满于结构功能主义，而强调要研究个体与社会的互动过程。心理学内部也开始反思重视内在认知机制而不够重视社会互动的倾向。因此，在两个母学科内部都有要重视社会互动的呼声。一直以来，心理学的策略便是与社会学中的结构主义更为相合，而这种重视社会互动的呼声，就是对传统心理学策略的结构主义立场的不满。大家可以看到，本书的工作尽管是从不同的理论脉络出发，但也同样属于这一去结构主义的浪潮。

克服危机的出路

在四面楚歌之中，主流社会心理学依然是岿然不动，固守着原来的园地重复开垦，但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在积极地寻找出路。斯奎尔将有关社会心理学危机的话语分为三类，这三类可以看作是克服危机的三种方向 (Squire, 1990)：第一类是主流话语。大致是一种改良主义的方案，它们诉诸修正和拓展既有的研究对象、方法和理论，但这种修正和拓展不改变其心理学的特质，它们仍然要借助于社会心理学中主导的认知主义及生物原理。第二类是替代性话语。它们质疑传统的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方法论和哲学假设，而更多借助于现象学和常人方法学的资源，它们尝试着网罗所有主流社会心理学所遗漏的主题，在这个意义上它们是替代性的，但同时也意味着它们是为主流社会心理学所限定的，而且与主流话语一样，它们依

靠的人的概念只是带有社会色彩的，但在最终的层面上仍然是生物性的单个个体。第三类被称为评论性话语。之所以将其称为评论性话语，是因为它们并没有提供一种替代性的整体方案，而更多地是对传统的研究进行质疑，它们是在做“解构”的工作，而不是“重构”的工作。它们对抗主流的认知主义的策略是靠研究有关社会世界的集体表征的结构和内涵，或者是用另一套方法来研究主流社会心理学中的概念，或者二者兼而有之。

从社会心理学的整体格局来说，克服危机的一种出路就是社会心理学的本土化运动。欧洲和第三世界国家不断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方文，1997），发展出不同于美国的研究方向和方法，而这种本土化运动与上述的第二、第三类话语实有诸多重合。

就本书而言，它正是冲破危机的一种努力，我们可以很恰当地将其归入第三类话语，而本书的两位作者也是欧洲社会心理学本土化运动中的重要一员。正如作者在中文版序中所言，他们在20世纪70年代接受主流社会心理学训练的同时，也正是社会心理学的危机话语方兴未艾之时，他们在布里斯托尔（Bristol）等大学受到欧洲社会心理学本土化运动的先锋泰弗尔等人的影响，而在知识结构上受后结构主义和文学理论影响至深，这些不同的知识潮流的碰撞和人生际遇的巧合，最终让他们走上发现话语之旅。

二、发现话语

20世纪的哲学经历了语言学的转向，这一转向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科学的发展。当1987年两位作者写出《话语和社会心理学》时，第一次系统地介绍话语研究在社会心理学领域中的运用，不能不说是受这一语言学转向的影响，这在第1章所简要梳理的理论背景中也可见一斑。面对社会心理学的危机，两位作者认为格根（Gergen）、黑尔（Harré）等人没有发展出令人满意的替代方案，因而抱着通过话语分析的路径发展出一套替代方案的雄心。而本书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份宣言，其后续的成果就是现在日益为人所知的言说心理学（discursive psychology，台湾译为论述心理学）。

将话语作为研究的中心，有其独特的优势和合理性，但为了更好地理解这种优势和合理性，我们有必要对相关的概念和观点有所了解。

话语和话语分析

何为话语？作者在书中坦言这是话语分析中用法最为混乱的一个术语。当然，我们这里也无法穷尽话语的定义，但我们关心本书是在何种意义上使用话语的。查勒比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目前的研究多数是把话语作为语言学范畴的概念（Chalaby, 1996）。话语作为语言学范畴的概念又有两种含义：其一是将话语等同于语言，比如罗兰·巴特在法兰西学院的演讲，就不对话语和言语（parole）进行区分。这一定义是目前社会科学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定义，现在的一个趋向是在这一语言学取向的定义中，纳入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的视角。其二是将话语等同于文本，这主要为语用学和修辞学等语言学科所采用。作者在前言中说，他们是“在最开放的层面上使用‘话语’这个词，它涵盖了各种形式的正式和非正式的言语互动以及各种形式的书面文本”。不过，正如查勒比所指出的，波特和韦斯雷尔所采纳的概念实际上接近上面的第二种定义，也就是将话语等同于文本。这在本书以及两位作者随后的一本书《图绘种族主义的语言》（Wetherell & Potter, 1992）中都可以得到确证。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采纳了这一定义，他们自然就不是在最开放的层面上使用话语这个词。许多研究者把非言语形式的体态、动作、感觉都视为话语（Purvis & Hunt, 1993），比如符号学“巴黎学派”的重要成员高概（Jean-Claude Coquet）就把身体感觉视为话语符号学的首要研究对象（高概，1997），这些在本书是付之阙如的。

不同的话语定义，相应就有不同的话语分析方法和不同的关注对象。本书作者采纳这一话语的定义，在很大程度上就定义了他们的研究关注点。他们自己也清楚地意识到，与福柯等后结构主义者（尽管福柯不接受这些各式各样的标签）相比，福柯等人更关注作为宏大历史进程中的语言实践或是整体的意象，而他们关注的是文本中的具体的话语过程。在《图绘种族主义的语言》一书中也特别将他们的研究旨趣与福柯等后结构主义者比较，认为他们的研究更带有修辞学的色彩，更类似常人方法学和谈话分析的研究。我们也可将他们的研究与冯·戴伊克的研究做简单的比较。冯·

戴伊克往往是研究文本的整体格局，以及这种格局与意识形态、权力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结构的分析（冯·戴伊克，1993）。波特和韦斯雷尔更为细微，他们更关注具体的词句的意义以及与语境的关系。另外，冯·戴伊克十分重视话语和认知的关系，而本书作者提出要超越内在心理的解释，因此，认知和话语的关系不在他们的研究视野之中。

我们还可以参照冯·戴伊克的三种话语分析方法的分类来理解本书的话语分析特点（冯·戴伊克，1993）：第一种是内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这是对文献内容进行客观、系统、量化分析的研究方法。第二种是意识形态分析，通过话语分析来揭示出深层的利益冲突，如罗伯特·迈尔斯（Robert Miles）对种族主义话语的研究就属此类。他们认为种族主义话语是对实在的不真实反映，其掩盖的正是不合理的种族秩序，而研究者对话语的分析，就是要揭示出话语内在的对既定秩序的合理化，也就是说，他们对话语的研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与之相比，本书的研究则是真正把话语作为研究的对象。第三种是诠释学传统，它不同于语法逻辑的形式解释规则和客观解释规则，而强调主观的解释程序，对解释对象的移情。本书对文本的分析可以认为就属于此列。

尽管作者有宽广的学科视野，但他们对自己社会心理学家的身份有着强烈的意识，因此在书中也多次强调他们是作为社会心理学家进行话语分析，明确地将自己的工作与语言学家的工作区分开来。后者的工作包括对句子一类的语言学单位的研究，对句子之间的结合与联结的研究等。

概而言之，本书的话语分析的方式不同于结构式的分析以及语法逻辑的形式解释和客观解释，而接近诠释学的投入理解，研究的关注点不是宏大历史进程中的语言实践或者整体的意象，也不是纯语言学的工作，而是文本中的具体的话语过程及其社会意涵。

建构与功能

受建构论的影响，本书不认为存在着能够脱离人们语言的客观实体，相反，社会世界和个体是被言语实践不断建构的，语言是建构的积极媒介。这也体现出语言哲学中奥斯丁等人强调语言的行动取向的重大影响。语言并不是客观实在的反映，而具有行动的力量。因此，对话语的关注便不是

要从话语中透视出某种客观实体的存在，而是分析话语如何不断建构社会世界。这里就引出功能的概念。在建构的过程中，语言实现着各种各样的功能，产生各种各样的后果。需要指出的是，作者在跋中提到现在更多地用行动或者行动取向（action-orientation）来替代功能一词，以避免功能给人一种机械的印象。就功能在社会学和人类学中的原初含义而言，功能总是暗示着一种同质的统一的整体（布朗，2002），而这种图景显然不是作者心目中的图景，他们所欲图呈现的是更为灵活和动态的画面。这一术语使用的转换，是值得我们留意的。

这里还想就建构赘言几句。在福柯对话语的分析中，他基本不关心功能、目的和意向，因为这暗示着某种实在的存在，他只关心“权力仪式的种种细节”（Wetherell & Potter, 1992）。与之相比，本书对话语的分析基本就是意向或功能的分析，在这个意义上，本书所持有的建构论不是一种绝对的即虚无的建构论。

在谈论建构的问题时，很多时候也带有政治和文化寓意。比如，格根等人认为，通过揭示出种族偏见的建构过程，我们会心存转变人类自身之可能（Gergen & Gergen, 2003）。在诠释学的脉络中，建构往往与共同体、沟通对话等相联系，因而提供了积极行动之可能。而福柯将建构与权力、控制相联系，因此往往赋予建构以消极的意涵。此外，建构论对文化观的塑造也扮演着矛盾的角色。一方面，它助长了一种无本体论的文化观，比如说认为不存在一个固有的中国文化或者说本土文化，有的只是变动不居的各种文化的组合和杂糅；另一方面，建构论又似乎强化了一种文化相对主义，比如凯瑟琳·卢兹（Catherine Lutz）的研究表明情感并不是普世的，而是置于具体的文化语境中被建构的。她所研究的一个叫 Ifaluk 的小岛的居民的情感词汇就不可以转化为西方的词语（Gergen & Gergen, 2003）。因此，同样是持建构论的观点，但很可能有着截然不同的政治和文化寓意。本书似乎是以价值中立的态度对建构的过程予以评述，未过多涉及其中的政治和文化寓意，但读者不可不保持一份敏感。

超越内在心理解释

传统社会心理学认为存在一种心理实体，例如态度、人格等，而谈话、

行为都可由这种心理实体生发出来。本书则认为心理是社会的建构，是一种言说的社会实践。因此，研究关注的不是内在的心理结构和心理过程，而要勾勒出这一言说实践的过程及后果，这便是超越内在心理解释的基本内涵。

对内在心理解释的不满，其实也是对内/外、主观/客观、个人/社会等悠久的二元两分的不满，而这些不满又可以归结为对个体主义的不满。放在我们目前的语境下，这种个体主义就是将个人的内心视为完全独立自主的、与其他人相隔绝的“封闭的个性”，其典型的隐喻是“封闭的黑箱”、“容器”等。埃利亚斯在批评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的这种个体主义倾向时指出（埃利亚斯，1998），这种观念在欧洲有悠久的历史。在古典哲学中，这一图景就是以认识主体的形式出现，个人是一个封闭的人，一个自成一体的小世界，拥有绝对的自主权，而意识不到与他人之相互依赖。从这种个人观出发，个人就似乎总是存在于社会之外的东西，在个人的内部与外部之间存在一条明显的界限。埃利亚斯指出，应该将人视为“开放的个人”，“个人与社会”不是两个割裂的存在，而是一个人的不同的但却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

埃利亚斯的观点实与本书的立场殊途同归，也就是走向一种更开放的、社会化的个人观。在埃利亚斯那里，是他对个人结构和社会结构的长期变化及二者之间的关系的关注引领他迈向这种观点。本书的作者则是由于将心理状态视为言语的社会实践，这种言语实践的本质上的社会性，让他们不能接受“封闭的黑箱”的个人观。不过，在埃利亚斯那里，似乎仍然保留一些心理的质素，而本书作者等人的努力，则近乎把心理实在彻底解构了。

有趣的是，话语分析的研究者并不必然反对某种心理实在的存在。冯·戴伊克试图将话语分析与社会认知理论结合起来，同时又不失分析的社会视野和关怀（冯·戴伊克，1993）。其主要的观点是，宏观的社会结构通过传播媒介等型塑了社会认知，这种社会认知又影响到人们的社会构想、社会交往和实践，进而影响社会结构的形成与转变。这样，社会认知就成为宏观社会结构与微观个体和群体行为的一个中介。研究者可以建立起种

种话语的社会认知模型，用话语分析揭示出宏观社会结构如何通过文本和谈话型塑社会认知，各种社会认知的要素如何被激发，又如何被运用于日常话语的表述之中。与本书将心理实体转化为社会性的事物的做法相反，冯·戴伊克实际是为社会性的事物披上社会认知的外衣。比如，他把意识形态视为一种复杂的认知框架，控制着其他的认知，如态度、社会表征和偏见。这种做法显然是本书作者所不能接受的，站在本书的立场，作者很可能会问：是否有必要为这些社会学的概念披上社会认知的外衣，它们是否有心理学的实质内涵？

同属话语分析的大本营，但对内在心理解释的看法迥然有别，其原因在于，本书作者是把心理状态转化为言语实践，因而消解了心理实在，言语实践则获得了一种本体论的地位；而冯·戴伊克则是承认社会、个人的本体论地位，话语只是这些不同的主体所使用的工具，而不具备本体论地位。归根结底，这是建构论和实在论的差异。也就是说，对话语的关注只有结合建构论的立场，才会真正走出内在心理解释的框限。

随着内在心理解释的被否定，个人与社会的二元两分的被消解，传统上被视为社会心理学的核心问题，即社会的持续与个体的独特性之间的悖论（方文，2002），就成为一个值得重新表述的问题，话语分析及其置身的广阔的理论资源或许能为我们提供丰富的启发。

话语分析的允诺

将话语置于研究的中心，其最大的优势在于，有可能将心理学的关注与社会分析结合起来。传统的社会心理学，都是假设社会场域（social field）是一个预先定义完好的社会群体的结构，假设心理过程是内在于个体之中，将话语仅仅视为一种媒介，主要表达和反映这些先在的心理实体和社会实在，因此将话语与行为、主体、社会过程区分开来，然而这些其实都是不可分割的。当本书把研究重点放在话语的具体过程，而且这些话语实际有着种种的行动取向时，话语的生产者就不仅仅是“主体”（subjects），而是“行动者”（agents），这样一来，对话语过程的描述和分析，也必然是对具体的社会过程的描述和分析。同样是迈向更具社会性的研究，与早先泰弗尔的社会认同论相比，这种话语的视角不仅

可以揭示出偏见的社会背景，还可以呈现出偏见形成的具体过程，比如偏见是如何被言说的，在具体的社会互动下，偏见话语产生什么样的后果，等等。在这个意义上，话语分析能为我们提供社会生活的更丰富、更细致的画面。

三、本书所涉及的几个问题

反身性 (reflexivity)

反身性 (又译为自反性) 在本书中是一个重要的议题，在对话语分析的批评与反批评中，更是一个焦点问题。

与话语的定义一样，对反身性的概念也存在着多种理解。吉登斯的反身性包括自我反身性 (self reflexivity) 和结构反身性 (structural reflexivity): 那种反作用于自身的反思性，被称为自我反身性；而反作用于能动作用的社会存在条件的反思性，被称为结构反身性。贝克则强调，自己的反身性概念与之不同，他认为上述的反身性是有意识的，而他更强调的是一种意料之外的自我消解，而不是反思 (贝克等，2001)。具体来说，贝克的反身性就是指现代化利用现代化来挖现代化的墙角，这是意料之外的，是没有反思的。现代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越是深入，工业社会的基础就越是受到消解、改变和威胁。这些反身性的概念是高度社会学化的，它主要描述的是现代性下的人的生存状态和整个社会的存在方式。在本书的语境下，反身性主要是和谈话、文本联系起来，不过，与前面的社会学的反身性概念也有一致之处。

本书对反身性给出了比较明确的定义 (第9章): 反身性的第一层含义是指谈话的这一特性，它既是关于行动、事件和情境的，也是这些事物的一部分；它的第二层的含义是，话语分析的发现对话语分析家以及任何其他他人所构造的社会文本同样适用。

第一层含义与吉登斯的理解多有相似之处，强调的是谈话和文本能够反作用于它所处的社会环境，并产生一系列的实际后果。举例来说，有一份心理学报告，说常洗头的人有更高水平的自信心。这样一份报告不仅是对现实的一种描述，而且更会重新塑造人们的行为。人们可能会因此更加

频繁地洗头以增加自信，但也可能故意不洗头来否定这一研究报告。

不过，在第9章中，作者更看重的是第二层含义，也正是这层含义引起很多争议。作者强调他们自己的文本与他们所研究的文本一样，都充满着建构性和行动取向。他们反对任何大写的真理（Truth）的存在，反对任何人对知识的最终权威。基于这种立场，他们多次批评许多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试图确立对文本解释的“最优版本”（the best version）是错误的，因为始终存在着另外一种解释的可能，研究者应该对自己文本中的建构性保持敏感。

为了体现出这种反身性，他们似乎看好学界中出现的“新文体”。这种新文体摆脱学术写作的标准规范，以平行文本的形式，一边给出研究者对所研究的文本的解读，一边把自己的研究也作为一个研究对象，给出自己的考察。但是，如果遵循这种反身性的思路，那将是一种永无止境的过程。因为，对考察的考察，仍然是一种建构，那我们是不是还要给出我们对它的考察呢？如此循环，又岂有尽头？

因此，对反身性的问题并没有很好的解决途径。批评者认为，在研究中给出这类反身性的考察，纯粹是一种自恋。他们提出应该放弃这种走入歧途的反身性观念，而倡导一种社会学的反身性观念（Fuhrman & Oehler, 1986）。他们认为，在社会学内部，对反身性的吁求，往往与对被某一群体或个人视为当然的假设进行考察相关。一种反身性的理论，是要帮助人们获得那些社会不让他们知晓的东西，那些他们作为社会的一员理应知道的东西。可以看出，批评者的反身性概念，某种程度上等同于反思性（reflectivity）。

他们指出，波特等人持有的这种褊狭的对反身性的理解正在把社会研究带往一个更无趣的方向。就科学知识社会学而言（波特在这个领域多有研究），他们不能提供对科学界的信念和知识的社会学理解，不能关注知识被生产和合理化的社会结构和过程，而只是为文本而研究文本（Fuhrman & Oehler, 1986）。在随后的一篇文章中，批评者进一步指出这种反身性观念实际是放弃了学者的担当，波特等人把反身性视为单个作者的问题或者是文本的特征，而不是一个攸关整个科学共同体的问题（Fuhrman & Oehler, 1987）。

其中的争论，孰是孰非，我们难以遽下论断，但这种种的反身性的观念还是值得我们特别留意的，因为我们都已接受这样一个共识，即知识远不是书斋里供人把玩的器物，也不是博物馆里陈列着的古董，在读与写之间，它们就充斥着我们的周遭，扮演天使或者恶魔的角色。

客观性

在上面反身性的讨论中，其实已经牵涉到客观性的问题。作者对反身性的重视，在某种意义上便是对客观性的拒斥。在本书中，他们多次提到话语是否真实反映内心状态以及事情的真相是什么的问题，不是他们所考虑的问题，更严格地说，这些问题不成为问题。这与作者所置身的思想脉络是一致的，从建构论的立场出发，不存在一个固定的唯一的真实，从反身性的角度考虑，所有的文本都有着行动取向和建构性。而这些观点，归结起来就是，不存在什么客观的标准。

但是，从本书和作者随后的《图绘种族主义的语言》来看，作者并没有完全摒弃客观性的问题，在一些论述的角落里我们仍然能找到客观性的踪影。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事实：作者先给出一小段话语（比如第2章有关波利尼西亚人的话语），相应的我们会得出一个解释；然后作者把该话语所置身的更长的话语序列呈现出来，这时我们会得出与刚才非常不同的解释。这样一个处理，往往是把放在更长话语序列中的对话语的解释置于一个更高的位置，也就是说，确实存在一个版本优于另一个版本的问题。这样一来，就出现评判不同版本的标准问题，而这个标准不能不包括客观性。

在《图绘种族主义的语言》中，作者提出，普通人的话语和社会科学家的分析都是言语构建，但是，相比于普通人的话语，科学家的话语对意识形态的实践在很多时候并没有直接的支持，在这样一个层次上，它们可能是通往不同目的的言语实践（Wetherell & Potter, 1992）。这句话颇耐人寻味，所谓不同的目的究竟有何不同？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科学家的话语之所以对意识形态的实践没有直接的支持，乃是因为他们在某种意义上更价值中立，他们要遵循一套严谨的被称作科学的程序，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会比普通人更靠近客观。而这种客观性，或许就是有别于常人的不同

目的。

与这种拒斥客观性的态度相矛盾的是，波特等人反复强调他们的研究不会“超越资料本身”（go beyond the data），而认为历史学家们往往是在资料中添入自己的解释，这样一种比较，似乎是在表示他们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更具有客观性。然而，这一点也备受批评，论者认为，由于人们的语言并不是透明的，可以一眼看穿的，因此研究者的解释只能是解释，而非资料本身（Shapin, 1984; Fuhrman & Oehler, 1986）。

由此看来，客观性并不是如此轻易就可以抛弃的，但客观性也不是如此容易就可以标榜的，尤其当本书确实是使用一种主观诠释的方法来分析时，更是如此。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对待客观性的问题呢？

语境有多大？

在本书的阅读过程中，我们其实一直在阅读着作者对话语的解释，这个时候，我们自然会问，这种解释是正确的吗，这种解释是从何而来的，它依靠的是什么证据呢？当然，作者会说，他们并不认为自己的解释就是正确的解释，因为始终有另一种解释的可能。但是，作者大概不会认为自己的解释纯属杜撰。事实上，他们在敦促我们要放在话语所置身的语境下来理解话语的意义及其行动取向。这一主张与符号学、行为发生学的观点是一致的。后者认为，行为具有符号学的性质，单纯的动作与它们的含义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天然的，只有在具体的乃至非常地方性的社会常规的语境下，这些动作才可获得意义。因此，对动作和行为的理解，是要依靠对语境的理解。由此，无论是对话语的理解，还是对行为的理解，其依托都是对语境的理解。这就产生一个问题：语境有多大？

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如果我们只截取一小段话，对这段话的解释往往是有偏差的，只要把这段话所置身的的话语序列呈现出来，我们就会得到另一种解释。我们可以把话语序列理解为语境，但某一具体的话语序列又有它自身的语境，由于语境是无限开放的，因此，语境也可能是无限大的。这样一来，由于语境的无限开放性，对语境有多大的掌握才拥有诠释的权利？这里，我们又遭遇到客观性问题，即我们是否能够找到一种标准，在这样一个标准下，我们能够确定出对语境多大程度的把握才是完备的，

从而来衡量不同诠释的优劣。

更具社会性的研究及人的概念

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话语分析方法最大的优势在于能够将心理学的关注与社会分析结合起来，迈向一种“更社会”的社会心理研究。在心理学史上，也不断出现过对心理学的社会化改造，如弗洛姆的“社会性格”理论（弗洛姆，1987）、泰弗尔的“社会认同论”（Tajfel & Turner, 1986）等。但这些改造，往往预设了一种心理实体的存在，这种心理实体成为沟通宏大社会结构和微观行为的一个桥梁。在本书中，则把心理实体去除了，在这个意义上，这是比社会性格理论等“更社会”的研究。

不过，社会性的概念也有好几个层次。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由于本书的关注点是在具体的话语过程，而不是福柯等人所重视的宏大历史进程中的言语实践。当他们说进行一种更具社会性的研究时，仅仅是把有限的行动者引入其中，而不考虑更为宏大的制度和结构因素，不考虑行动者与制度结构的互动如何型塑了言说实践，以及这种言说实践又如何重构了制度结构。相对而言，两位作者在随后的《图绘种族主义的语言》一书中，则有意识地纳入了更宏大的制度和结构因素。

在迈向更具社会性的研究时，我们也有必要听听不同的声音，这些声音在20世纪60年代是十分兴盛的，它们所针对的正是这种更具社会性的研究所隐含的人的概念。朗在一篇著名的文章中，批评结构功能主义中的人的概念是过度社会化的（Wrong, 1961）。结构功能主义在回答霍布斯的“社会秩序如何可能”这一问题时，借助于社会规范的内化这种观念。朗认为，这是一种“社会决定论”。规范的内化受到弗洛伊德的超我观念影响，但却忽略了弗洛伊德理论中的强有力的本我与超我控制之间的张力。朗主张要回归弗洛伊德的人的观念，弗洛伊德认为人是一种社会性动物，但绝不是完全社会化的动物。无独有偶，同一时期也出现了著名的“马尔库塞和弗洛姆之争”。这一争议也是源自对弗洛伊德理论予以阐发的立场之不同。马尔库塞和弗洛姆都欲图使弗洛伊德的学说成为一种批判的革命的学说。不过，对马尔库塞来说，这一批判的基石是弗洛伊德的里比多理论。里比多的被压抑是导致个体对既定秩序的顺从的根源。因此，批判的锋芒